

教学科研相得益彰 为人学真诚平和

——记中央党校罗平汉教授

□ 王 毅

(一)

我入党校工作后参加的第二个教师节表彰大会上，罗平汉老师作为教学优秀奖获奖代表发言。我现在还记得当时听罗老师发言的感受，比较实，少了些“套路”，多了些“干货”。其中罗老师谈到党校教学要有针对性，要正本清源，要积极回应学员乃至社会上的种种疑惑及难题。当时因为自己还没走上主体班课堂，所以体会不深，后来自己开始上课后，越发感觉罗老师的话在理。

党校学员都是领导干部，学历比较高，实践经验丰富，对历史、对社会感悟深刻，因此，他们一般会带着很多问题来党校，希望得到解答。党史也是学员特别感兴趣的学科，所以提出问题不少，一些问题见解独到、专精。这些问题既是对老师的挑战，也为老师提高教学针对性提供了思路。如果不去关注和回应这些问题，而是自以为是地自说自话，这堂课是一定不能达到传道授业解惑目的的。罗老师善于总结教学中的疑难问题，将不同班次、不同学期学员共同关注的问题提炼出来，形成新的科研生长点进行研究，最后再将研究成果运用到课堂教学上。这就是罗老师常常强调的教学促进科研。

大致梳理一下罗老师这几年发表的文章，不难发现很多都是回应教学中的疑难问题。比如土改合理性、正当性的问题，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风的主要原因，毛泽东是否快速转向、放弃了《论十大关系》的正确思想，等等，这些因教学产生的研究成果已经用于教学，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最近几年，罗老师又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比如早期中共领导人大多出身较好，有优渥的生活和体面的职业，缘何选择马克思主义甚至为了信仰舍家弃业、牺牲生命？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这应该是罗老师这几年开辟党性教育新讲题进行的新思考。由此反思，包括我自己在内的一些党校年轻人常常困惑于教学和科研“两张皮”，其实二者未尝不能结合，只是有时候我们过于留恋自己以前的研究方向而缺乏教学和科研的针对性。

教学促进科研，反过来，科研也



能为教学提供支撑。罗老师经常自嘲，自己的普通话没有湖南话标准，但事实上他的教学评估却常常名列前茅，原因何在？我想，就如罗老师经常告诫我们的那样，讲课必须建立在研究之上，他的课就是建立在自己多年研究基础之上的，他是用自己深入的研究去说服学员的。早在20多年前，罗老师就开始到各地档案馆查阅档案，课堂上常常呈现他从档案馆获得的一手资料，史料论据扎实。罗老师不善于做课件，只会最简单的蓝底白字呈现他多年的研究成果，但瑕不掩瑜，精确的党史细节和深刻的分析往往赢得学员一致好评。现在，我们一些年轻人也承担了罗老师讲授的“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群众路线和调查研究”课程，虽试图创新，但仍难以跳出他建构的学理框架，原因就是研究不够成熟，还不能自成话语体系。

包括对现在社会上流行的一些历史虚无主义观点，罗老师也一向主张真要把问题搞清楚、让讲课有说服力，还是要去研究，要用事实说话。应对那些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用真正有学术含量的成果来回应，让学员知晓其中真相，知道其到底“虚无”了什么，事实又是什么。在这方面，他

身体力行，为全校学员开设了“中共党史研究中的若干重大争议问题”的讲座，澄清了许多问题，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我想，这就是真正“用学术讲政治”。

(二)

罗老师常说，做学问的有三种人，一种是为了职称而研究的人，一种是有发表欲的知识分子，一种是把学问当成人生追求的人。他自诩为第二种人。事实上，罗老师说法过于自谦。他的学术道路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他对学术执着的热爱和追求。罗老师博士毕业后去了广西师大，他原先是研究中日关系的，本来可以吃博士研究老本的他，因为觉得继续研究中日关系没有条件，于是改攻当代中国农村史。在没有任何经费支持下自掏腰包，走南访北，到处搜集档案材料。

2003年到中央党校后，因为最初教学任务还不重，罗老师一有时间不是外出查找档案，就是在办公室看书写作。近年来，因为行政职务及教学任务加重，不能再像刚入党校时那般全身心投入写作，但只要有时间，不管是否周末或节假日，罗老师都会到办公室埋首苦干，风雨无阻。天道酬勤，罗老师近

年来相继出版了《农村人民公社史》《回看毛泽东》《“文革”前夜的中国》《“大锅饭”：农村公共食堂始末》《中共党史重大争议问题研究》《一九五八至一九六二年粮食产销的几个问题》等论著，既涉猎广博，又不乏专精，特别是对公共食堂、精简城镇、粮食统购统销等问题进行了专门的系统梳理，展现了许多以往不为人知的历史细节，在许多方面推进了党史研究。

上面提及的学术专著出版后引起了较大的反响，不仅学界人士普遍认可，某种程度上还得到了大众的认可和接受，比较“畅销”，这从这些专著后来不断的修改、再版就可以看出。我认识一个学古代史出身后来从政的学员，他对罗老师的书有种相见恨晚的感觉，觉得罗老师用清新流畅的笔调把历史还原了，做到了学术性和可读性的统一。这正是罗老师一贯追求的写作风格。他认为，学术论著既需要高精尖，也需要大众化，而高精尖和大众化有机结合更好。他一贯反对概念的堆砌和故弄玄虚的高精尖，他认为真正大家的东西，往往通俗易懂，能为普通大众所接受。

具体到怎么研究历史，罗老师也有自己的心得和感受。历史研究分两种，一种是复原，一种是解释。罗老师自诩是“工匠”，做的是“搬运”史料、复原历史的工作。罗老师虽然说得云淡风轻，但是研究历史的人都知道复原历史并不容易，要还原历史必须尽量站在一个客观公正的立场，同时还要占有大量的资料。罗老师在这点上比较突出。他尽量摒弃个人境遇可能产生的偏见，站在相对客观的立场去研究历史。他注重实证研究，推崇上层和下层、高层和基层结合互动的研究范式，主张将高层的活动、重大决策的出台之类，与底层的个案分析，即高层决策在底层的贯彻和消解结合起来。这条路显然充满艰辛，不仅需要熟悉中央文件、领导著作，更需要大量的来自底层的资料支撑，比如地方基层的档案。所以罗老师说自己的研究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他常年实地调研特别是跑各地档案馆，寻得了许多珍贵一手资料，这也是支撑他论著的主要资料。在利用地方档案方面，他和同辈学人相比是属于比较早的。

当然，接近、复原历史到一定程度，就有了解释历史的基础和能力。在这一点上，罗老师自称为“工匠”，其实更多是一种自谦，他也有很多在充分考证基础上解释历史的尝试。比

如中国到底有没有新民主主义阶段的问题，罗老师作过一些考证，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指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的许多根据地和解放区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头几年的中国社会是符合新民主主义特征的。又比如如何看待社会主义改造，现在有人说，早知今日，何必当初，指责共产党过早放弃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罗老师从当时语境出发，分析了主客观原因，回应了争议。现在我们上课还是用罗老师的这些考证去解释当时的历史。

(三)

对自己的学术自谦，其实罗老师在生活中、工作中也秉持这种低调自谦的态度。部里年轻人经常向罗老师求教，他从来不会好为人师地盲目说教，而是真诚帮助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润物于无声之中。教研部的年轻人都比较喜欢和罗老师交谈，准备新课时向罗老师求教，申请课题时也跟罗老师交流，因为他对年轻人的生活、工作总是尽量给予理解，尽可能帮助大家。

从整个教研部的发展来看，罗老师也很会因人制宜，充分发挥老师们的不同个性和各自专长，带领整个教研部前进。最近党史部有个大手笔，在罗老师的努力下，和人民出版社签约，出版一批学术专著，整个项目叫大有文丛。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都苦于找不到好的出版社出书，这正好解决了这一问题。当然，罗老师对青年教师也不失严格。他一再告诫年轻人不要太急功近利，特别是不宜盲目到外面单位讲那些自己没有研究过的不熟悉的课，认为还是要先做好学问，把基础打牢，眼光应放长远些。

作为领导，罗老师比较服众。我个人觉得原因可能有这么几个：一是因为罗老师乐于帮助和指导他人，大家从心底比较佩服和尊重他；二是因为他本身的教研水平较高，加之在他带领下，教研部的教学、科研有一个良好的发展势头；三是因为他平时对自己要求比较严格。他总是把各种评奖机会让给别人，甚至在讨论一些分配方案时为自己设上限。上行下效，在很多问题上党史部老师都很注意分寸和规矩，维护了长期以来形成的良好部风。



党史研究中的细节和主流

□ 卢 毅

曾几何时，中共党史是一门显学。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有一些学者用当时档案开放的难得机会撰写了一批严谨之作。但毋庸讳言，因为惯性使然，那些成果还带有较浓厚的传统党史编撰色彩，存在着史料单一、人云亦云、不够深入等不足。还有许多党史著述仅是简单罗列中央文件和领导人讲话，缺少普通党员和民众的身影，看不到基层组织的活动，只有宏大叙事，缺乏历史细节，只有上层决策，未见下层互动，结果往往将一部本来生动丰富的中共历史画卷写成了枯燥无味的八股。所幸的是，这种状况如今有了很大改观，党史研究渐呈一种复兴之势。近年在学界颇具影响力的学者，大多与党史有关。正是他们的奋力耕耘，才使党史研究有了新的突破与发展。

近年来党史研究为何能取得突破？我以为，党史从来都是人们普遍关注的热门话题，因而拥有广大的阅读市场。而随着时代的进步，人们日益需要了解真实的历史，这就为党史研究的进步提供了驱动力。这些年，一些学者开始尝试用实证的史学方法来研究中共党史。他们分析注重细节，论断强调证据，力图通过对历史细节的丰富展现，还原被遮蔽的历史真相，接续断裂的历史链条，为学术界呈献了

一系列令人耳目一新、极具功力之作，产生了很大反响。这种努力及其取得的成绩本身就预示着，只有用纯粹的实证史学方法，党史研究才能有所突破和深化；同时也只有把历史细节告诉读者，才能真正有说服力 and 生命力，形成广泛的影响。

综观这些成功之作，最大的特点就是注重对历史细节的发掘。既能满足读者渴望了解真相的需求，扩大受众群体，同时更深入细致地来看，其实也有利于人们进一步深刻理解中共成功的来之不易。正如有论者所言：“殊不知，曲折的历史、充满坎坷的历史，才是最打动人的历史。”在传统的党史著述中，中共与民众之间似乎是“挥手”和“跟随”的关系，将复杂的历史进程简单化，忽略了革命动员的艰难性。只有摆脱以往那种“政策—效果”的单向思维，把革命的复杂性和曲折性讲全、讲深、讲透，才能真正打动人心。

当然，还需要注意党史研究中的另外一种倾向，即一味渲染一些负面现象。如今有些人打着“恢复历史真相”的旗号，以挖掘历史细节为名，掂掇个别材料，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甚至故意编造谣言，片面夸大革命和建设中的失误。实际上，这种只关注历史某些支流和局部的研究，与事实相去甚远，不仅无法从全局和趋势上解释

中共革命和建设成功，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历史的主流。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在社会现象方面，没有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的方法了。罗列一般例子是毫不费劲的，但这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或者完全起相反的作用，因为在具体的历史情况下，一切事情都有它们个别的情况。……如果不是从全部总和、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而是片断的和随便挑出来的，那么事实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甚至连儿戏都不如。”这就要求我们在研究党史时，必须着重把握历史发展的主流，否则极易陷入某种支流不可自拔。

况且，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最鲜明的品格，也是最大的优势。中国共产党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敢于承认失误并善于纠正错误，具有很强的自我修复能力。因此，党史研究既不能回避失误，把艰难曲折的历程直线化，又不能以偏概全，必须在充分展现历史细节的同时不偏离历史主流，不仅要看到历史上的某些失误，更要看到党纠正错误并最终走向胜利的这一趋向。唯有如此，才能不断推出有说服力、广大读者愿意看的成果，也才能把党史做成真学问。

深化党史研究的着力点

□ 李庆刚

中共党史研究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在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深化党史研究，党史前辈大家如龚育之、张静如、郭德宏等都作了相关论述，提出了许多富有启发性的观点和见解。揆诸其观点，结合学习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有关新观点新论述，深化党史研究，可从以下几方面继续作进一步探索。

第一，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角度深化党史研究。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革命的最终目的，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的主线。1945年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中明确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

解放生产力的。”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标准，最根本的、起决定作用的仍是“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也强调指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必须坚定不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因此，应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纳入党史研究范围之中，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标准，来衡量政党、集团和个人的历史作用，来评判历史事件的性质、作用和意义等。

第二，从现代化的视角深化党史研究。“现代化”也是十九大报告的一个关键词。推进现代化建设，是党的三大历史任务之一。尽管现代化理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流行的，但它与马克思恩格斯所追求建立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有相通之处。实现中国的现代化，也是中国共产党一直追求和奋斗的目标。中国共产党96年的奋斗史，就是追求实现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1949年以前是变被动现代化为主动现代化的阶段。应深化对中国共产党在推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决定性作用的研究；对重大历史事件的作用，对个人和群众的作用，也要从中国现代化的角度进行分析，即看他们在社会现代化进程中起了什么作用。

第三，从社会发展和变革的角度深化党史研究。“发展”与“变革”也是十九大报告出现频次很高的热词。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的进步，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一个质量互变的动态过程，社会是在发展和变革两种状态的交替过程中前进的。中国共产党近96年的奋斗，实现了

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实现了中华民族由近代不断衰落到根本扭转命运、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飞跃，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伟大飞跃彪炳史册，但并非一蹴而就。我们既要重视对社会变革（革命）的研究，也要关注对发展（进化）作用的梳理；既要把发展过程看作社会变革的基础，也要探究社会变革是怎样促进社会发展的。

第四，从社会意识的角度深化党史研究。历史唯物主义非常重视社会意识，党史也应该重视对社会意识的研究。在承认和坚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基本原理的前提下，不能忽视社会意识的反作用和影响力。首先，应加强对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研究，这也是十九大报告非常重视的一个方面。其次，在研究系统化的社会意识的同时，还应该重视对非系统化的社会意识即社会心理的研究，研究它与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路线、方针、政策的关系。再次，要重视对社会思潮的研究，揭示各种社会思潮的哲学基础及其发生发展状况，研究马克思主义同各种敌对思潮之间的斗争等。

第五，从创新研究方法入手深化党史研究。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也是深化党史研究的第一动力。党史研究要在坚持科学性、政治性结合的过程中大力创新，特别应大力推动研究方法的创新。2010年在全国党史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同志指出：“既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优良传统，坚持和发展党史工作积累的成功经验和方法，也要吸收借鉴古今中外史学研究的有益经验和方法，还要积极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创新党史研究的手段、方法、载体。”这实际上对深化党史研究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也是党史工作者努力的方向。